

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

发展国营经济 扶助私营经济

1950年后,银川市的经济和工农业生产逐渐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市委和政府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在生产结构上发挥国营经济(即1949年后国家陆续建立的各类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在所有制形式上,采取五种经济成分共存、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格局,充分发挥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其主要体现在物资调运、金融信贷、物资批发及日用百货、杂货的调拨和批发等环节中),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经营(主要体现在具体产品的加工和零售),打击不法商贩的投机倒把活动,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有重点地扶助手工业生产。

整理摊贩,加强管理。根据省政府整理摊贩的指示精神及宁夏省第一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整理摊贩的决议》,结合银川市的实际,1951年初,市政府成立“银川市摊贩整理委

员会”,又于同年5月11日成立“银川市摊贩管理委员会”,对全市流动摊贩627户(其中领证者348户)、固定摊贩553户(其中领证者478户)进行全面整理,加强统一管理。还新成立了新华街和民生街两个市场,解决原银川市市场布局不均的问题。

实行明码标价,保护消费者利益。银川市工商业在发展的同时,市场上出现了少数不法商贩在产品中掺假、偷工减料、尤其严重的是漫天要价、欺骗消费者等问题。市委和政府针对这种情况,按照中共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指示精神,提出对商品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由市工商科具体组织领导。市工商联和工商业界推选出的11名代表组成“银川市推行明码标价委员会”,对文具、旅栈、修理、纸烟、照相、浴理、服装、百货等行业实行明码标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重估财产,调整资本。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防止不法商贩投机倒把,特别是针对当时出现的虚张经营情况(即没有资金而注册有资金;资金少

而注册资金多的经营),市政府于1951年7月3日成立“银川市重估财产评审委员会”,开展对银川市的私营工商业进行重估财产、调整资本的工作。此次对银川市的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中的投资、货物、物资保管及账目等都作了细致清查和审核,使政府掌握了全市工商业户的情况。

发放贷款,实行加工订货。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利用、限制”的政策,通过贷款,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对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资金有困难的工商业户,给予必要的资金扶助。截至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银川办事处共发放贷款2595万余万元(旧币),同时一年中救济失业工人及城市贫民333户共1114人,发救济粮炒面12895斤、小米6000余斤,解决了一些私营工商业者在生产和经营中的困难,推动了银川市工商业的发展。

1949年10月,市政府开始委托私营手工业作坊加工民需食品、木器、粉条等。1950年,为了支援中国人民

志愿军,委托私人加工厂为部队加工皮衣2000余件、军鞋1.4万余双、棉花12万斤,加工农业生产需要加工镰刀7000余把。政府订货解决了私营手工业的生产及销售困难,促进了私营手工业的发展。

为了实现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繁荣市场,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195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市政府在银川召开了一次大型物资交流大会。参加物资交流大会的有国营、合作社23个单位;私营工商业户22个行业,881户;全省各县、市(旗)代表团共10个单位,总计各种物资成交额为157.3亿元(旧币)。物资交流会对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繁荣城乡经济起了推动作用。

随着银川市国营、集体和私营经济不断发展,到1952年底,全市工业企业发展到119个(其中国营7个、公私合营1个、合作经营9个、私营102个);工业总值达到586万元(旧币),比1949年增加了2倍;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562万元(旧币),比1949年增加了2倍。 (据银川党史网)

车轮滚滚六十载 小站情怀满关山(三)



站台的调度室。

当初修铁路支线的人很多是从湖北、浙江调去的,有些是转业军人;铁路职工是从甘肃、宁夏(包兰线)正线上抽调去的,还有少量是从外地招工去的;而火车站职工由几部分组成,一是兰州局从各单位陆续抽调;二是车站新招工;三是修完铁路的人直接转过来;四是子女接班的。过去有几百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像固沙草一样,守护在远离市区的铁路旁,繁衍生息,工作生活。一栋栋铁路家属房就建在附近,散发着红红火火的人气儿。火车站有98名职工,有近20名院校毕业学生、复转军人;铁路警察不算在内,铁路派出所的13名警察为客运服务,每次4人,算上协警7人至8人;每次8名铁路职工接送客运列车。新参加工作的职工都是院校毕业生。

铁路公寓为1959年建设,与铁路同时建的配套设施,主要用于机车司机、运转车长住宿,还有些乘务员在此偶尔休息。铁路小学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校长是从干塘、中卫包兰线上调去的。后来,建了俱乐部、卫生所、食堂。1959年,市商业局在铁路建了配套供应站,盖了一排砖瓦人字顶房子,是最早的大商店—国营商店,后来市商业局盖了一排房子用作各类店。每天有大武口的供应车送货来;还在这里用火车给山里送米面油蔬菜。如今平汝支线仍然是用供应车一水槽罐车皮,给山里沿线小火车站送水。上世纪80年代这里又有了银行,再晚些有了邮政所。那时火车站候车室前面的广场可谓热闹繁华之极,广场四周一圈全是地摊式菜

市场,除了大商店,个人经营的饭馆、小商店纷纷盖起来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了迪斯科舞厅,夜生活很是红火。这时期铁路机务段、桥梁、公务电务、水道工区、电力、卫生所、公寓俱乐部共有职工2000多人,加上家属4000多人。机务段是财务单独核算的部门(其他部门由银川铁路下辖)。大武口的铁路各部门、单位还负责管理山里的各线路。从大武口到汝箕沟线,技术设备上,过去的货车、客车是蒸汽机车,共28台,大武口车站负责检修。上世纪50年代用的是日本造的反修、反帝和上海造的上游车,上世纪80年代用的是国产建设型蒸汽汽车;上世纪90年代改用牵引力大的前进型蒸汽机车;1999年底至2000年换用东风4型内燃机;2006年换用韶山3型电力机车;2011年以后主要用和谐电1、电3型电力机车,韶山3型用得差不多了。

大武口车站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最红火,1996年下半年煤炭市场开始繁荣,一直到2015年之前,货运量每年是上升的,最好的时候是2013年、2014年,平汝支线公司在银川地区货车发送量占主要份额,而银川又在整个兰州局占主要发送运量。那时火车每天空车上山,重车下山。从2015年以后,随着煤炭市场下滑,车站装车、发运量下降;最明显的下降是大武口洗煤厂撤销后,车站人员都减少了。过去车站有200多人,现在不到百人。过去调车机3台,现在是1台;过去一个班调车组是3组人员,一组4人,现在调车组是1组人员,一个班次3个人。旅客发送量从

过去到上世纪90年代都是稳定的。2016年矿搬到宁东,人员到了银川、宁东,车站客运减少了。车站的派出所早期警察多,中间那些年人员减少,这两年治安、维稳,客车进出站,每次至少8个公安民警上下车执勤巡察服务。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火车站西北方向,有大片建材厂家属区和一些其他家属区。夏季,一栋栋红墙灰瓦平房,与前面的大片绿油油的菜园相映,远处是田野和树木,大武口乡与之相邻,鸡鸣狗吠,一派桃源风光,火车站曾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如今,曾经的歌舞厅、拉面馆都颓塌了,铁路小学也早已不见。从前繁华的火车站小广场长满了杂草,周边小平房都拆成断壁残垣,只留那些树木在空旷沙地里述说着曾经的繁华。周边的居民老房差不多都拆了,老巷子里面的老榆树、野枸杞疯长。大武口火车站即将被遗忘的站台,邮件、快递已不再投递到这里。古旧的小站却还在运行,不久的将来,它也许会消失在风中。离车站不到半里的地方是货运场,装货、卸货都在这里。离车站1公里的泄洪涵洞,水泥桥上行驶火车,桥下行走汽车、自行车、驴车、行人,如今也寂寥了很多;距车站1公里高的西北处是大武口电厂,两幢高耸的烟囱,冒着浓云一样的白烟,伴随着远行火车的隆隆轰鸣声,袅袅飘向天际。

(据石嘴山市档案馆)

宁夏南部先秦、秦汉时期政区地理初探(上)

行政区划是国家对所辖领土进行分级管理的区域结构,是在中央集权出现后的产物,是为统治和管理土地和人民而设置的。我国的行政区划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春秋时期,各诸侯统治者相继在各自的统治范围内划分地方行政区,任命贤能或立有军功者管理,使原来的世袭采邑变为诸侯国内最高统治者任免官员、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从而形成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县和郡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开始出现于春秋时期。其中,县的设立比郡早,郡的建置从战国时期始明确出现,而且逐渐演变成成为县一级以上的一级政区。秦国从商鞅变法时起,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统一六国后,将郡县制推行于全国,建立起郡、县、乡、里四级行政组织。

学术界认为,今宁夏南部设置行政区划始于战国时期,始设乌氏县,为今宁夏境内最早的行政建制。

秦国乌氏县的设置及相关背景

公元前688年,秦国“伐邽、冀戎,初县之”,灭邽戎、冀戎,在其地设县,置邽县(今甘肃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在边境地区设县,除表示政治上的占领外,主要为军事性质。属于秦国占领少数部族族居居住地而新设的地方行政区划,为秦国最早的县,亦为中国最早的县。

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年),秦国攻义渠并设立义渠县(今甘肃宁县西北)。此应在整个陇东地区首设的县级行政区划。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年),秦国攻义渠25座城邑,并继续西向陇山中段发兵,攻占乌氏戎地,据学术界推测此时设立乌氏县,根据学术界对乌氏县地望基本一致的意见,即认为乌氏县治在今固原东南部。缘此,乌氏县应为今宁夏全境始设的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

明确提出战国时期设乌氏县的是唐代历史地理著作《括地志》,《括地志》云:“乌氏故城在涇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人戎,秦惠文王取之置乌氏县也。”

战国时期的设县(包括秦国)情况,仅有零星的记载。秦国也仅有两个不一致的设县数字如31县说和41县说,具体的县名和县治的地望记载甚少。战国以至秦朝的设县大多来自考证,主要依据“汉承秦制”的思路,以西汉的设县情况,来反溯推断秦朝、战国的设县情况。乌氏县设县也是据西汉设乌氏县的推断,以及灭义渠戎设县的推理。乌氏县设于秦国在全国普遍设县35年之后,即在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令一,四十一县”,为“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之后。乌氏县设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显然,乌氏县不在31县或41县之列。

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始置北地郡(郡治今甘肃宁县西北)。战国时期,郡尚不辖县,(郡亦属军事设置),乌氏县应不存在由北地郡管辖的问题。

关于秦国乌氏县政区的地望

乌氏县的设置来自秦国对乌氏戎地的占领,“乌氏戎地”在何处,《史记·匈奴列传》有明确记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泾、漆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泾”指泾水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漆”亦指漆水。就是说泾水以北为乌氏戎生息地,亦为西戎八国之一乌氏戎国地望。泾水以北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在泾水的北面,似可不包括泾水流域;亦可理解为在泾水的上游。《史记》的编撰者司马迁曾到过今宁夏南部,对“泾水以北”的地理判断自然是与他如果未到过今宁夏南部显然是不一样的、有区别的,关键是后世的研究者是否有可能或不能准确理解司马迁的表述。司马迁关于乌氏戎地望的记载即乌氏戎在泾水以北,是关于乌氏县政区地望的最早最直接也是最可靠的证据。据此,乌氏县政区的地望应在今宁夏南部、甘肃平凉一带。

关于秦国乌氏县治的地望

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乌氏县治在今宁夏南部。战国秦乌氏县治的地望在历史记载中不甚明确,是历代学术界关注与讨论的问题。大多数学者(包括甘肃平凉市学者)认为,泾阳县古城址在今平凉市安国镇油坊庄。据此往上推断,乌氏县治地望应在瓦亭(今宁夏泾源县大湾乡瓦亭村)。目前,学术界的

定论是在今宁夏固原市泾源县东南、甘肃平凉市西北,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即持此观点。但仍有不同意见,尚有需要继续搞清的一些问题。持不同观点者认为,战国秦乌氏县治在甘肃平凉市城西的大统山下,论据是当代新发现的一枚居延汉简。该汉简记载了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陇山地区的几个地名及其之间的里程,其中有乌氏、高平、月氏、平林置等。

秦朝宁夏南部行政区划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全国为36郡,推行郡县制,实行二级区划制,郡始辖县。秦朝,今宁夏南部属北地郡,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北地郡东邻上郡,东南接内县,西南界陇西郡,西临月氏、北通九原郡(河套地区)。北地郡辖县(道)12个,其中今宁夏南部设2县,今泾源县部分地属泾阳县(县治今甘肃省平凉市安国镇油坊庄村)。秦朝,仍然没有今宁夏南部行政区划的直接明确记载。学术界依然根据“汉承秦制”的反溯推定,以确定秦朝在今宁夏南部的行政区划。境内设二县,一为乌氏县,县治疑在今宁夏泾源县瓦亭村;一为朝那县,县治今宁夏彭阳县古城乡。朝那县的设置应迟于乌氏县,朝那县在乌氏县以北。秦代,今甘肃平凉市境内设泾阳县,辖今平凉市西部及今泾源县部分地(秦代,内史亦有泾阳县,当为存疑之处)。秦代县境,“县大率百里”。 (据《宁夏文史》)

移民岁月

第一百零七期

YI MIN SUI YUE

一生承诺支宁情(三)

汪智泉 口述

我是一名民政干部。在宁夏民政部门工作40余年,是从自治区民政厅编志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离休干部。期间还在宁夏社会福利院当过2年多副院长。从事过支宁安置、复转军人安置、人民代表选举、社会救济等工作。除了完成正常的业务工作外,我觉得在有几件事值得回顾一下。

第一,3年困难时期,在支宁青年面临生活极度困难,前后发生一些伤亡事故,一大批浙江支宁人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纷纷逃回老家。作为国家干部,曾经的带队干部心急如焚,深感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反复思考,决心冒着犯错误、受处分的风险,要向时任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领导如实汇报,大胆建议:请组织批准送一批支宁青年回原籍。经与蹲点的其他带队干部吴国良、诸天行商议,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于1961年初请示民政厅厅长傅展如同意,报区党委副书记马玉槐批准,由民政厅发文市县各单位执行。采用放长假回乡探亲的办法,由支宁青年个人申请,单位批准,发给路费,自带口粮关系,党团关系。仅此一项,批准了3万名支宁青年安全有序返回浙江。避免由盲目逃离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人员意外伤亡。

第二,1976年,我担任民政厅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负责人期间,接收了一批复员军队干部。他们中许多人在部队期间已经结婚,有了子女,其配偶在宁夏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这些人在部队工作多年,有文化,有工作能力,政治素质较好。按一般情况,从农村入伍的要回农村去安置。他们要求解决家分两地的困难,给予适当照顾。我认为此要求是合理的,宁夏又需要建设人才。为此,我向区委副书记安置复退军人领导小组组长写了专题报告。经副书记邵井蛙批准,将这批复员军人按特殊情况特殊解决,把他们安排到区市县企业和农林牧场工作。仅此一项,7年时间,办了3000多名复员军人的安置手续,为区市县留住了一批有用的建设人才(其中好多人是外省

市的)。

第三,我在民政厅编志办公室担任主任期间,从1985年开始,负责编撰民政厅志的工作达13年之久。亲自主编和参与编著的有全国大型辞书《中国国情大全·西北宁夏卷》《宁夏民政志》《宁夏民政大事记》《浙江青年在宁夏》《当代中国的宁夏》等书籍。并在浙江支宁青年来宁夏40周年时,主持筹划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浙江支宁人员名录》一书。书中收录了1000多名可以联系到的在宁的浙江青年,得到了自治区和银川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这也算我在离休之后,为浙江支宁人所能做的一件实事。

第四,作为当年被指派的浙江支宁人员的带队干部,我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把开化县600多名支宁青年顺利地带到了宁夏,并配合宁夏当地干部尽力做了安置工作。虽然种种原因有90%的人都返回原籍了,我自己从没有动摇信心。并尽自己所能,努力践行了扎根宁夏、建设边疆的诺言。我们夫妇共养育了二男二女,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成人、教育成才。大儿子汪勇大学学历,1971年参军,在解放军兰空雷达部队当指导员,转业后任宁夏哈纳斯天然气集团副总裁。201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曾获得国家人事保障部、国家纺织协会颁发的劳模奖章和证书。小儿子汪涛获大学硕士双学位,任宁夏粮科所副所长、工程师。工作中取得多项发明和科研成果,其中一项荣获中国科技博览会金奖。小女儿汪洪,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下属的宁夏食品检测院副院长,为宁夏经济建设努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的成长令我和老伴的内心感到由衷欣慰。我当年是23岁来的宁夏,我在这里生活工作60个春秋,对大西北的黄河、黄土地已有深深的感情,宁夏已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坚持留下支宁,无怨无悔,如今也算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了。

(吴金遨 马晓虎 整理)

支宁教师 西行铺路

——记宁夏大学原校长张奎(十)

1993年,张奎光荣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代表大会期间,张奎谈论教育改革的话题最多。1995年,张奎在全国两会上首次提出宁夏高校合并的建议,希望得到国家部委的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参加宁夏代表团讨论并对他的建议表示肯定。宁夏高校合并步伐正式起步。经过几年的努力,四校合一实现,这是张奎在任宁夏大学校长期间做出的最大也是最难的一件事。

张奎:宁夏是个小地方,几百来万人口,师资力量、教学资金、争取支持等方面都难以形成凝聚力,前行的发言得到李岚清同志的充分肯定,李岚清同志在讲话时说:“宁夏教育事业起步较晚,而且起点偏低,国家也想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但学校的数量太多,实在难以平衡,支持了这个不管那个肯定不行,要是全部支持,其他省区又肯定不干,国务院也难通过,要想争取到国家更多的支持,就必须走合并办学的创新之路。”李岚清同志还批示给时任自治区主席白立忱,要加快研究合并办学的事情。这个话题成为当年宁夏代表团最热门的话题,很可惜的是,宁夏代表团太小,只有14位全国人大代表,而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30人以上的联名才能提出议案,所以宁夏代表团只能向国务院和国家教委提出建议,好在都得到了肯

定的答复。

张奎在随后的几年里为合并办学多方奔走,合并方案也几经波折,张奎称之为好事多磨。1997年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在奔跑与繁忙中想摆脱行政管理的繁杂,再上讲台,当一名好老师,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1997年夏天,自治区党委作出让他喜忧参半的决定,再次任命他为宁夏大学校长和党委副书记,喜的是经过10年的奔走,合校之事有了眉目,他有机会把这事做到底,因为他知道“四校合一”才是宁夏大学发展的康庄大道;忧的是合并后的专业调整意见难以统一,前行的路还是荆棘载途。无论喜悦,服从组织决定是他唯一的选择。

1997年12月26日,宁夏工学院、银川师专、教育学院和宁夏大学四校合并,重组了宁夏大学,无论对宁夏高等教育还是宁夏大学来讲,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宁夏大学具有了重整旗鼓再上新台阶的更多条件。教师队伍稳定、科研水平提升、招生数额扩大,又向全国211系列迈进。“四校合一”让宁夏大学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01年,64岁的张奎退出领导岗位,但还在教育道路上奔走,没了任职校长期间的身心疲惫,张奎感受到无官一身轻的快乐,精心教学和潜心科研占据了大量时间,直到70岁前,他始终没离开大学的讲台。

(商银生 撰稿)